

評《族群、國家治理、 與新秩序的建構》

鄭瑋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黃應貴主編，台北：群學，2018年10月，384頁。

做為「新世紀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的第五冊，《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一書被主編黃應貴教授定位成：從台灣研究個案的特性出發，將族群性（ethnicity）加以歷史化與脈絡化，以凸顯其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中的特性，進而對族群性這個課題提出了有別於目前西方社會科學界的命題與論點。

在本書〈導論〉中，黃應貴首先區辨並釐清做為國家治理手段的族群，它在台灣歷史中所經歷的轉變軌跡：亦即，前現代帝國憑藉儒家的道德倫理與文治教化，培養臣民的忠誠，平定地方的叛亂，在鞏固皇權之後，讓地方社會在既有的人群分類、生活單位和頭人政治下進行互動與聯盟；現代民族國家則以全景式族群分類與相應的戶政、地政及警政機構，對其轄下的人民與土地進行全面統治，革新了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新自由主義國家一方面被市場邏輯滲透而難以規訓人民，另一方面以人口為對象，藉由服膺於統計學原則的權力技術來對人們進行常規化，遂行了生命政治。他主張，藉由仔細區辨並掌握政體的權力性質及統治或治理技術、政體正當性所仰賴的意識形態、人民對（理想）政體的社會想像，以及特定時代下地方社會的真正關懷與國家或政體之間的相互關係，才能找出並確立適切於時代與政體性質的分析概念並進行解釋，不至於陷入概念時代錯置的泥淖。

其次，有別於目前國際學界確立了新自由主義下政治經濟一體和族群性之間的多重糾葛與辯證，他認為本書收錄之個案指出了族群（或文化）認同與個人認同的連結，以及多重族群認同的出現。因此，他提出了三個當代族群性研究的新命題：其一，當代族群性關乎人們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其二，當代族群性研究必須面對自我與社群性之新模式的浮現；其三，上述命題進一步涉及了當代人們透過怎樣的機制（例如：儀式、市場），建構跨族群、跨地域乃至於跨越社會文化界線的新秩序。最後，他引入歷史人類學對於地方社會居民或被統治者的關懷與主觀認識，提出跳脫國族史的多元歷史觀點，反思目前台灣學界對族群性的研究仍受限於現代性與經驗論科學觀的知識範疇與論證特性。

王甫昌〈群體範圍、社會範圍、與理想關係：論台灣族群分類概念內涵的轉變〉一文，提出「是否能從『四大族群』分類與論述的轉變中，提煉出能有效解釋未來族群現象發展的『台灣族群概念』？」這個問題意識，以情境（時空與社會條件）、主要行動者、推動的力量或機制以及發生的場域等切入，從群體範圍、社會範圍與理想關係三個層面，來探究清領至 2000 年台灣社會的人群分類架構從祖籍、地域群體轉變為族群身分類屬的歷史過程，該過程同時也是台灣的社會性質與政體性質轉變的過程，亦即，從面對面的互動朝向能夠想像遠方他人的抽象化，從中國民族主義的想像邁向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從社會位置與政治資源不平等被扭轉，邁向政治機會平等發展的民主化過程。其次，作者指出在 1980 年代浮現至 90 年代廣為接受的「族群」概念，係特定時空與社會情境下的歷史產物，這是由成員間共同的社會位置來界定，而非（或不僅）由「文化特質」（或共同性）。新浮現的「族群」分類概念的政治論述結合了相應的政治行動，的確改變了台灣的政治體制。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族群」問題非但沒有消聲匿跡，反而一方面廣泛地與文化特性相互指涉，另一方面族群被繼續沿用於處理新一波婚姻移民所遭遇的社會不平等，卻造成了制度性排除之實而有如新種族主義的非意圖後果。

陳文德〈從卡大地布（卑南族）部落到「斯卡羅（族）」？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群認同的省思〉一文探究，台東縣卡大地布部落的卑南人透過口傳、文獻與小說中所述之斯卡羅人的歷史功績，希望證明該部落住民乃是斯卡羅的後裔。藉由主張自身做為部落與靈力的雙重源頭，當地居民一一拜訪斯卡羅後裔的部落以確認彼此的「族裔」關係，希望藉以變卡大地布在歷史上受挫於南王部落的社會屈從，以及官方將他們歸入以南王舊地名的「卑南族」這個分類上的屈從。甚至，他們以對於起源地 Ruvuwa'an 的認同為號召，呼籲恆春與南迴公路上排灣化的族人，甚至鄰近阿美族聚落都能加入，企圖創造跨地域、跨族群的人群認同。值得注意的是，卡大地布居民以不同文類的「歷史」打造「斯卡羅族」的過程中，密切關連到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帶入了一系列關於文化復振的實作與想法，因而更有意識地推動文化展演與文化產業，追求部落界線與文化形式一體化，乃至於人群、部落與宛若國族的族群身分彼此相互蘊含的真確性。

陳怡君〈「人不做，要做番？」從 2016 年屏東縣熟註記談起：屏東萬金的例子〉一文指出，屏東沿山地區歷史上的人、番之別這種具有彈性的生活範疇，主導了該區域內不同聚落居民之間婚姻與物資交換，並形成相當複雜的社會網絡，卻也導致萬金居民被他者所貶抑的集體身分。隨著天主教會進入萬金致使當地居民接受西方的文明教化，而一整年的教會禮儀節期與親屬關係更成為他們認同的核心，此一地域化認同又因為隨著文化觀光活動湧入觀光客這些新他者，讓雙方的關係既可暫時聚合又可被區辨。就此，聚落所在的社會歷史沉積與特性不只說明當地人對於藉「熟註記」以取得平埔族這個身分的態度相當分歧，新的社會轉變更促使居民展現了以自我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做為形塑與展現認同的特性。

林開世所撰寫的〈當代「族群現象」的在地運作與矛盾：恆春半島滿州地區的考察〉一文，主張研究者應避免將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建構的官僚式的範疇，當成定性更古遠的歷史材料的出發點，甚至當做解釋現象的第一因，而是要去探究：當族群這個現象被建構出來之

後，是如何被人們所經驗與使用？為了說明這個立場，他以滿州地區從歷史上人、番類別、歷經現代國家治理下看似沒有族群問題的人群互動，到日常生活中交錯使用人、番這種具有彈性的生活範疇與國家治理下的原住民這個官僚式的範疇，甚至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轉變，這兩類範疇都因為日常機遇（contingency）而被賦予了更多超乎預期的實質特性或內容。特別是，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產業難以為繼，導致區域整體經濟沒落，墾丁國家公園的出現限縮了一般企業的開發，弔詭地允許大財團進駐周邊地區，最後鄉公所只好放寬各村從事生態觀光與文化觀光。儘管內容與形式明顯受到大學相關科系師生介入之影響，在多族群混居的村落所進行的生態觀光或文化觀光，族群性卻以不同方式被調動，例如，老人與青壯年仍具影響力的社區就以導覽原住民文化與山林觀光為主，對比於年輕人主導的社區則強調擁有專業山林知識的嚮導與自然解說，以遠古的原住民傳說與意象做為點綴。

夏曉鵬〈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一文指出，在新的區域地緣政治與經濟的重新定位與政策轉向，台灣社會將東南亞與中國配偶建構成第五大族群的論述，使原本被視為「社會問題」的「低劣他者」的移民人口及其後代，搖身變成拓展區域政經關係的先鋒，有如台灣的社會資產。然而，在相關的移民政策與文化教育活動中，經常可見對這些東南亞與中國新住民進行階級化甚至帶有種族主義意味的作為，這種以階級化的族群／移民打造國族認同的過程，持續現身於當代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進行式之中。

既然族群是關乎人們對自身社會位置的全體想像符號，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手段與後果，那麼，我們要如何解釋：當族群做為表達社會不平等的概念並引發相關政治行動，致使「差異但平等」廣被接受之後，為什麼族群在二十一世紀反而變成強調某種身分本質的「文化特質之重返」呢？而一向為族群身分賦予文化實質的人類學家多少在迴避「為何文化認同看似朝向本質化發展？」這個趨勢。或許我們可以從族群性做為表達關係與意識樣態（modes of consciousness）的符號

及其象徵化過程的特性來重新定位這些問題，並試圖提出不同理解的方式。

在他那篇廣為引用的“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一文中，John L. Comaroff（1987）提出有關族群性的五個命題當中，就有三個是關於做為歷史過程之產物的族群性，是如何以表達社會秩序與不平等的符號這項特性，經由意義指涉的機制與物化過程而被誤認為是解釋社會現象的原則。首先，族群性同時描述了一組關係與一種意識樣態，當以族群團體的出現與族群意識的覺醒來表達社會群體間的結構性不平等關係時，就需要有意義的意義指涉（signification）或者文化再現。這些文化再現並非武斷的，因為這些再現不只是經由群體成員身分，來掌握並理性化那些有關物質、政治與社會權力的不公平分配，同時更將所有不平等歸因於群體的內在特質（intrinsic nature）。因此，每個群體的「天生命定」（ascriptive）的特性就變成了其「族群的」身分，並以否定集體他者來建構群體的集體自我。族群意識透過群體這個形式展現出來，該形式被用以意指與象徵這群人對於人我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之經驗。

更重要地，族群性傾向於呈現為一股自主的力量，或者，以一種能夠決定社會生活過程的「原則」這種自然表象出現，這讓人們以特定方式去感受社會的運作，驅動了社會實踐，理性化（rationalize）了對個人與集體利益的追求，並回過頭來形塑了顯性的關係、群體與身分。以先天命定的文化差異來理性化不平等結構的社會體系中，族群性被物化為存在上的真實，且被賦予一個足以形成社會世界秩序的自主力量的表象，並產生作用。弔詭地，以族群身分來表述社會不平等以追求社會公平的政治行動，存在著根本矛盾，即，去反轉族群身分所表徵的「天生命定」的不平等這項行動，很有可能強化了族群性做為社會分化原則的重要性，並確認了以下看法：身分確實為集體的自我界定與行動提供了唯一可及的基礎，連行動失敗都被看成是對族群聯繫的肯定。由上我們看到，以族群性做為表達不平等的結構與符號有著雙重內在矛盾：它不只給予了族群性一個客體化的表象，更驅

動了且理性化了那些斷言族群性乃是遍在於社會之自主力量的眾多社會實踐（Comaroff 1987: 308-309, 313-318）。

從 Comaroff 區辨出族群性做為符號與做為實質這兩個層次，論證其做為表述不平等關係與意識的符號所經歷的物化甚至造成人們誤認的過程，讓我們清楚看到，何以族群性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及其做為一個應被解釋的對象，卻往往被視為形成社會秩序的原則的分析架構。即使特定的族群分類架構（如四大族群論述）在台灣進入新世紀後看似功成身退，當族群身分或族群類屬依然還是地方社會用以理解社會秩序與關係、表達政治意見甚至分類新移民的參照點時，研究者很難迴避族群性這個符號，如何持續成為人們面對與理解社會秩序的常識範疇。換個角度來看，若我們能認識到族群性做為符號及其被物化為社會生活的自主力量這個層次，以及族群身分的實質往往在歷史過程中被指認因而高度異質，或許能鬆動研究者將文化認同本真化（authentication）的傾向，並認識到「聚落文化先於個人而存在」乃是特定政治經濟下的產物，至於人們在新的政經條件下，為了打造出（新的）「族群」身分而持續生產「被客體化的文化符碼」做為其實質，則是另一回事。

當然，族群性這個符號在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產生了重要轉變，主編引用 Comaroff 夫婦的看法，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族群性呈現為兩個彼此對反之事物的反直覺接合，既是天生命定的、也是工具性的；既是內在的，也是建構的；關乎血緣、也關乎選擇。這直接關連到新自由主義下的族群身分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亦即，「意識形態讓位給身分本體論（ID-ology, ontology of identity），成為政治介入的基礎」（黃應貴 2018: 6-7），更是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面向。事實上，該過程部分地關聯到主編引述 Taylor 所言，現代國家的個人是以同時性這個世俗範疇而得以直接接觸到整體，並以去中心化的眼光來捕捉社會，此外，具有自我意識的自由個體之認同是類別性的，不再是網絡的或關係性的（黃應貴 2018: 16-17）。Comaroff 夫婦進一步指出，在資本、資訊、人、符號與風格的跨境流動之下，市場霸

權對國族與國家邊境產生了既分裂又強化的矛盾作用，將民族國家推向異端的自我想像，進而影響人們建構自身做為社會人與政治主體的方式，特別是市場給予人們自決與選擇的自由，而自決蘊含著本真的自我承認與社會認可之間的對位。在上述條件下，個人對集體的依附關係將轉移到那些不需被中介的人類生命的根本基礎，例如，種族、宗教、性傾向、世代與族群，同時，政治生活的焦點將從政體（body politic）轉移到以政治化的身體做為具體社會連結的來源和起源。在所有人類生命的根本基礎中，族群性被證明是建立不同尺度的人之間相似、承認、依附、結盟與動員的原則。就族群意識做為文化分歧性的社會符號學載體這一點而言，族群性變成了多元相對主義的共同語言。在此，要求道德上與物質上的提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聲稱族群擁有自然的、內在的權利，這是基因實質與裸命的權利，也是在當代為何「文化」被視為自我建構的根本所在。此外，從族群性與文化形式商品化複雜的糾結這一點來看，族群性同時涉及了經濟、倫理與美學等層面，若研究者將族群認同化約為（狹隘的）政治認同，無疑將窄化了個人生命安排、命運與普遍價值的細膩之處（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9: 46-48）。

上述論點勢必引發對本書個案的幾個提問：其一，在書中所謂以個人認同來結合族群認同或文化認同甚至創造多重認同的論述，並未清楚說明一個以地域認同或是具有彈性的生活範疇或圖騰式的鬆散範疇來表徵個人的集體身分，在意識上是如何轉變到以個體人的基礎來確立與結合個人身分與其他高於個人之類別性的認同？這進而關聯到族群性做為符號的意義指涉難以再遵循現代性符號學下的意指與所指之間單一對應關係，或者說，意指與所指間的關係有所斷裂。其二，本書亦提到當代地方社會的人們持續使用族群性這個符號來創造新認同的實質時，我們不只看到政治經濟利益或市場邏輯的支配，以及被調動的族群性被賦予了客體化的文化符碼，更看到一群人自認與重要他人間的社會／權力關係之理想樣態這種更深層的文化邏輯。事實上，這多少呼應 Comaroff 夫婦提到南非 Bafokeng 人在從事族群

企業初期的公司治理係依照他們理想中的權力運作方式（儘管之後被董事會取代），作者們稱之為權力的想像（imaginings of power）（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9: 106-110）。最後，除了族群認同是否只等同於政治認同之外，筆者更想追問：顯然，造成當代台灣社會不平等的來源並不是只來自於政治，那麼，人們又是以怎樣的概念或符號來表達這些不平等，並促成政治行動？若要掌握族群性的性質，我們恐怕不只要面對族群、國族與種族主義這組關係，更要去探問構成當代台灣社會的另外兩組關係，即，族群身分與公民之間以及族群身分與階級之間的關係，究竟從現代化過程到進入新世紀後發生了怎樣的轉變，以至於台灣社會呈現出與被再現為今日這般面貌？

筆者十分樂於將這本以台灣當代族群性與國家治理的紮實研究個案為基礎，提出有別於西方學界對於族群性研究的趨勢與理論貢獻的研究論著，推薦給對於當代族群性、國家治理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等議題，感到興趣的讀者。

參考文獻

- 黃應貴，2018，〈導論〉。頁 1-58，收錄於黃應貴主編《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台北：群學。
- Comaroff, John L. 1987.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Consciousness, 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 *Ethnos* 52(3/4): 301-323.
- Comaroff, John L. and Jean Comaroff. 2009. *Ethnicity, In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